

民国时期华侨私立图书馆发展探究^{*}

——以新会景堂图书馆为例

莫艳红

摘要 民国时期,华侨纷纷回乡捐建图书馆,用以启迪民智,救亡图存。新会景堂图书馆是由爱国华侨冯平山先生独资创建并负责全部办馆经费的华侨私立图书馆。文章概述了新会景堂图书馆的创办缘由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过程,并从图书馆、读者、社会环境三方面深入分析其发展壮大的因素,揭示华侨私立图书馆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因。图1。表2。参考文献27。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华侨 冯平山 景堂图书馆 私立图书馆

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Libraries by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Jingtang Library in Xinhui

Mo Yanhong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verseas Chinese came back hometown one after another to make donations for the setting up of libraries to enlighten the people and save the nation. Jingtang Library in Xinhui is on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rivate libraries, which was solely donated and constructed by Feng Pingsha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Jingtang Libra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alyses the causes of the prosperity and maintaining lasting vitali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rivate libraries in terms of library, reader and social factor. 1 fig. 2 tabs. 27 ref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verseas Chinese; Feng Pingshan; Jingtang Library; Private Library

民国时期,国弱民穷,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认为兴办图书馆是一条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途径,纷纷解囊在家乡捐建图书馆。例如,1918年,著名侨领陈嘉庚在家乡福建集美创办集美学村图书馆;1922年,爱国华侨冯平山在家乡广东新会创办景堂图书馆;1928年,旅缅华侨在家乡云南和顺创办和顺图书馆;1933年,旅美、旅加等粤籍华侨集资建成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华侨捐建图书馆主要有集体捐建、个人捐建、宗亲捐建三种方式,冯平山先生不但独资捐建景堂图书馆,还常年提供全部办馆经费,这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并不多见。因史料缺失,目前有关华侨私

立图书馆的研究尚比较匮乏,缺乏深入详实的考察,如以“景堂图书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进行检索,虽有论文十余篇,但这些研究成果仅限于浅层介绍,未能详尽反映景堂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及办馆特色。近期,笔者在整理馆藏档案资料时,发现一批有关景堂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档案,约二十余册,内容涉及馆务工作的诸多方面。本文以景堂图书馆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还原景堂图书馆的创建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过程,并从图书馆、读者、社会环境三方面深入揭示一所县级华侨私立图书馆如何发展壮大并保持长久生命力。考察这种具体、鲜活、微观的图书馆

*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新会景堂图书馆馆史档案汇编”研究成果之一。

案例,将会有利于我们更深入、更直观地探究民国时期华侨私立图书馆的生存发展情况。

1 创办缘由

景堂图书馆创建人冯平山(1860—1931),名朝安,字平山,广东新会人,年少时在港创业,待家业兴旺后,后半生主要为公益事业操劳,以兴办文教事业的功绩最为突出。先生因业务需要遍游海外,这些经历使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曾在《自记》中写道:“余尝考外国富强之术,莫不先注重教育。”^[1]另据《冯平山先生七十寿言汇录》所载:“游于欧美,考察百业,旁及教育,既归,见吾国教育设备,办理多不如人,遂务兴办教育,不遗余力。”^[2]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坚定了先生教育兴国的信念,先后在香港和家乡新会捐建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项目。在景堂图书馆创设之前,先生以巨款捐助邑内外学校,独力举办者,在新会会城镇有冯氏义塾、木工

学校、平山小学三间。后见会城镇学校教育初具规模,社会教育事业尚未起步,故斥资建立图书馆,以扩展教育事业之范围,普及于民众,使民众能自学自习,由无智而进为有智,由知识浅陋而进为知识高深^{3}。并以父亲名字“景堂”为名,以兹纪念^[4]。

2 发展过程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1938年,日军占领景堂图书馆所在地新会会城镇,景堂图书馆遭受重创,据此背景,可将景堂图书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沦陷前快速发展阶段、沦陷中艰难生存阶段、抗战胜利后恢复办馆阶段。

2.1 沦陷前快速发展阶段

从1925至1938年馆史档案中搜集各年度经费、藏书量、开馆天数、阅览人数、图书借出次数等数据,形成表1和表2。

表1 景堂图书馆各项统计数据(1925—1938年)

年度	经费(元)	开馆天数	阅览人次	图书借出次数
1925年	6070.09	130	30821	0
1926年	4928.30	279	27491	51130
1927年	5163.64	280	41279	89062
1928年	6216.19	291	51949	99537
1929年	5674.85	278	48646	96763
1930年	5315.34	294	62472	143099
1931年	4452.11	294	74877	149310
1932年	8401.77	297	88853	199716
1933年	7479.12	297	98290	201598
1934年	6990.09	285	113262	196069
1935年	6987.70	363	164592	247228
1936年	6298.62	360	246676	362321
1937年	5493.42	360	276505	433636
1938年	5228.74	365	321048	477976

注:(1)因1925年6月22日开馆,故1925年开放天数仅有130天;

(2)因1925年末开通馆外借阅服务,故图书借出次数为0。

表2 景堂图书馆馆藏统计数据(1926—1938年)

年度	中文图书(册)	儿童图书(册)	中西杂志	中文报纸	图表
1926年	11815	1227	38种 892册	27种 302册	168幅
1927年	14522	1542	56种 1924册	36种 536册	277幅
1932年	23630	3437	555种 7220册	57种 1954册	644幅
1933年	29340	3897	634种 9842册	58种 2349册	655幅
1938年	41941	3933	16940册	2441册	690幅

注:因馆史档案仅有表中各年度馆藏数据,1928—1931年档案缺失,故此表数据不完整。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沦陷前的景堂图书馆资金投入稳定,典藏图书数量稳步上升,开馆天数日渐增加,到1938年甚至达到全年日日开放,阅览人数和图书借出次数更是爆发式增长。景堂图书馆当时主要服务区域的常驻人口约15万人^{[5](1)},1938年平均每人每年到馆阅览约2次,外借约3次,这些业务数据表明景堂图书馆当时的发展已具备相当规模,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2.2 沦陷中艰难生存阶段

2.2.1 减少损失,转运珍贵图书赴港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各地纷纷沦陷。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等沦陷区图书馆及藏书家将珍贵图书寄存到同为冯平山先生创建的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以避战乱^[6]。考虑到连绵战火即将燃至新会,冯氏教育董事局决定将景堂图书馆部分珍本、丛书等运存香港,减少损失。前后约有2万册珍贵图书先打包寄存在馆外,然后于1939年8月经澳门、走水路运抵香港,寄存在冯氏“居安园”内,1949年3月又从香港运回景堂图书馆^{[7](9)}。正是这批珍贵图书,缓解了战后景堂图书馆藏书量不足的问题,使景堂图书馆得以迅速复办。

2.2.2 景堂图书馆总馆毁于一旦

为了维护社会安定,避免人心动摇,冯氏教育董事局从大局出发,决定总馆同县府同进退,馆内尚存3万余册图书和部分馆具未做转移。1939年4月2日,总馆所在的新会县沦陷,日

伪军把留守在馆的工友驱出馆门,将馆内图书及馆具全部抛出馆外,馆舍先后被宪兵司令部、伪警察所占领^{[8](6-7)}。冯氏辛苦经营、规模略具的景堂图书馆总馆毁于一旦。

2.2.3 乡下办分馆,继续服务民众

会城沦陷之前,冯氏已预见到总馆受战争影响可能停办的情况,于1938年12月在罗坑、凌冲开办了分馆,并将近四分之一的馆藏(约15,000册)运到分馆,其中包括2000册的战时图书^{[7](13)}。会城沦陷后,景堂图书馆不忘本馆的文化使命,在乡下分馆继续开展业务,宣传抗日,服务民众。后因时局混乱,管理员离去,罗坑分馆合并到凌冲,且于1941年增设天亭分馆。其间,凌冲人谭想来往于香港、凌冲之间,转运冯氏基金会所拨款项及基金会代购的新书、新报刊等,分馆业务得以正常运作^{[8](9)}。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冯氏函告停办景堂图书馆,分馆图书及馆具交由新会县立民众教育馆使用。景堂图书馆虽然暂时停办,但它的图书及馆具仍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2.3 抗战后恢复办馆阶段

日本侵华战争对景堂图书馆造成了致命打击,然而历尽劫难的景堂图书馆不忘初心,从废墟中东山再起,重续辉煌。抗战结束后,景堂图书馆回到会城,因县府借用馆舍,延至1948年9月才得以复馆。复馆之初,满目疮痍,工作极其艰辛。寄存在港之图书尚未返回,由分馆运回图书杂志合计仅1333册,虽有部分民众捐书,也仅有杂志91种,图书约2000余册^[9]。在这种情况下,景堂

图书馆只好采用渐进方式恢复办馆,约每半年开放一室。1948年10月报纸阅览室开放,1949年3月复办普通阅览室。景堂图书馆虽规模未具,却深得读者垂青。据1949年4月的统计资料显示,逢周日阅览人数约700,逢周六阅览人数约400,周一至周五平均每日阅览人数约170。因室内仅能容30人,人满之时在门口挂“现已客满,请为稍候”的纸牌,出现了排队阅览的盛况。1949年全年投入资金14,965.99港元,在仅有4名馆员的情况下开放360天,接待读者278,360人^[9]。

3 发展因素分析

民国时期,很多私立图书馆由于资金短缺,缺乏专业人才和专业化管理,缺少创新意识,不能契合民意开展各类读者活动等原因而被边缘化或受到冷遇。而景堂图书馆却能不断发展壮大并保持长久生命力,这主要得益于图书馆内部

管理科学、资金稳定、服务创新等因素,同时也离不开读者和社会的支持。

3.1 图书馆内部因素

3.1.1 组织架构

景堂图书馆在1925年9月馆史档案中记载有组织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从图1大体能看出冯氏的管理脉络:冯平山先生组建新会冯氏教育董事局,董事局聘任馆长,馆长聘任主任,主任聘任馆员。馆长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主任协助馆长进行管理。各项馆务工作分工精细,由馆长、主任分配至馆员落实完成。馆内定期召开馆务会议,并将主要情况向董事局汇报,重大事件需由董事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这种管理模式采用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合理设计管理层次,把集权和分权有机结合起来。董事局既能把握办馆方向,又能给图书馆留有足够的空间灵活处理馆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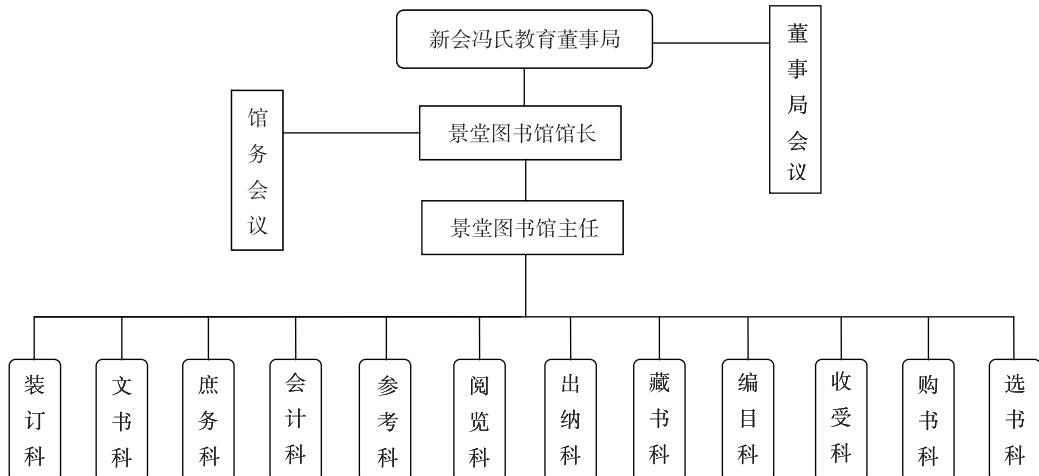


图1 1925年9月景堂图书馆组织系统^{[10](5)}

3.1.2 资金来源

由表1可见,景堂图书馆每年的资金投入基本在5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浙江省图书馆1936年调查,全国1935年年经费2万元以上的省馆仅9所,1万元以上的11所,青海省馆仅1800元,西康省馆仅260元^[11]。作为一所县级私立图书馆,景堂图书馆的经费可以

说相当充裕,这也是它能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为了保证资金来源,冯平山先生拨定现款5万元作为图书馆的基本金,贮存于东亚银行收取利息,将利息作为图书馆的日常费用^[12]。这笔资金由冯氏基金会进行专项管理,管理制度规范,不会因为冯氏生意失败或某一位重要人员的离去而陷入危机。1931年,冯平山先生离世,哲嗣秉华、秉

芬继承家族事业，继续由基金会管理景堂图书馆，景堂图书馆的资金没有因为冯平山先生的离世而受影响。这一点与很多私立图书馆不同，比如穆耀枢开办的四川女子图书馆、草堂图书馆等，也因为穆氏的去世而告停顿^[13]。

3.1.3 人才使用

董事局聘请学识较高的地方文化名流担任馆长、主任，他们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书籍有着深厚感情，对文化发展也颇有见地，能够为图书馆的发展献计献策。首任馆长陈照薇（1894—1954），出生于新会外海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广东高师本科毕业。1924年8月到馆任馆长，1933年底离任。受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为人开明，积极从事公益事业，热心推动教育工作，常年活跃于香港、新会两地^[14]。第二任馆长李仪可，广东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本科毕业。1926年8月到馆，1927年至1941年间任主任，1948年景堂图书馆恢复办馆后任馆长，曾兼任新会十小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是新会知名教育家^{[8][18]}。1927年陈照薇提出，景堂图书馆僻处一隅，若固步自封难免落后，欲申请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1930年又有这个提案，但未能实现，待到1932年10月经梁廷灿先生（梁廷灿先生为邑人梁启超先生之侄）介绍得以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15]。在李仪可的倡导下，1933年1月23日馆内成立图书馆学研究会，以求图书馆事业之发展及增加馆员服务效能^[16]。陈照薇、李仪可以及他们所带领的图书馆团队，怀着对图书馆事业的满腔热忱和责任，从图书馆日常运营的规范化、服务方式的创新性，再到抗战期间的文献转移、乡下办馆，战后的恢复重建……都展现出一代图书馆人的风姿，为景堂图书馆的发展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

3.1.4 读者服务

民国时期，景堂图书馆秉承启迪民智、服务社会的理念，致力于读者服务工作，根据读者需求，不断调整服务模式，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民众使用图书馆的措施：（1）图书借阅。1925年的《阅书人应知事项》第22条称“所有图书均无复本，

不提供馆外借阅”^{[10][11]}；1926年的《馆外阅览规程》规定“借书出馆外，概不收费，每次最多3册，最长时间为一星期”^{[3][39]}；1933年对1926年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完善，规定“一星期内没读完，可以续借，续借不得超过3次”^{[5][82]}。从不提供馆外借阅到可馆外借阅再到可以续借，景堂图书馆不断改进服务模式，提高图书利用效率。（2）巡回文库。选择通俗浅白之书籍，用流通书箱、流通书架，巡回陈列于各公共机关及马路上，以便民众就近借阅^{[5][97]}。“巡回文库”使读者不必到图书馆即可借阅图书，便于通俗易懂的图书流向社会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最底层民众，能够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3）开架阅览，分级阅读。1926年的《儿童室阅览规程》规定“按要求填妥借书券后问管理员取书”^{[3][38]}，1933年的《如何到儿童阅书室阅览》规定“签名后可自由取阅开架图书，另有部分书按小学程度分为高、中、低三阶段”^{[5][85]}。开架阅览，既方便读者无障碍地查找图书，又能提高馆员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分级阅读，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阅读能力来提供不同的读物，有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4）读书会。1926年10月1日，景堂图书馆馆务会议决定组织“读书会”，公开招募“读书会”会员，每月举办一次活动并提交读书录，将优秀作品付之油印，文字极有可观者给予奖励，以引人人向学之心^[17]。“读书会”活动能培养读者良好的阅读习惯，为读者研究读书方法、探讨书籍内容、训练写作能力搭建平台，对民众获得知识、实现文化启蒙和形成良好读书风气也具有积极意义。（5）图书展览会。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南京政府举办全国性的“儿童年”，1936年4月4日为“儿童年”之儿童节，景堂图书馆从4月4日起至7日止举行儿童读物展览会，短短4天时间，观众人数不下一万五千人^[18]。图书展览会能够促进儿童读书，提高儿童阅读常识，引起一般社会人士尤其是父母师长对于儿童阅读指导与选择的重视。（6）免费馆情刊物。1926年编印《景堂图书馆概况》、1933年编印《景堂图书馆指南》、1938年编印《景堂图书馆简

况》，介绍该馆成立时间、创设目的、馆舍地址、规章制度、馆藏文献目录、图书借阅方法等内容。这些刊物免费发放，让民众充分了解并学会利用图书馆。

3.1.5 抗战宣传

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大变革时代，救亡图存是这一时期的社會主题，当抗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时，全民抗日热情渐近高涨。景堂图书馆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民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向民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传递最新抗战资讯。其主要工作方法有：(1)采购战时图书。在繁杂的救亡图书中，搜寻战时各方面知识的精髓，采购战时图书一千多种，并设专室供读者阅览^[19]。(2)编制专题书目，如《战时图书目录》《卢沟桥事变研究书目》《抗战戏剧研究书目》《八·一三事件研究书目》。(3)举办专题展览，如“一·二八”纪念图书展、“革命先烈纪念日”图书展览、“卢沟桥事变”图书展览、“八·一三”抗战图书展览^{7}。(4)沦陷期乡下办馆。在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乡下办馆，宣传抗日，坚守知识文化的前哨，为救亡战士提供精神武器。

3.2 读者因素

侨乡新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读书氛围颇浓，在纸本时代，图书馆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知识及信息的需求。民国时期，新会民众按文化水平大致可分为：知识分子、一般学生、普通识字民众、目不识丁者4类，每一类人都有使用图书馆的需求，广大读者的需求促使民国时期景堂图书馆蓬勃发展。

3.2.1 图书馆于知识分子

古城新会，文风鼎盛，先后诞生了理学大师陈白沙、维新先驱梁启超、国学大师陈垣等众多文化名家。勤读好学的风气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热爱阅读，勤于钻研。景堂图书馆开馆后，知识分子纷纷走进图书馆，查找资料，撰写著作，开展学术研究。同时，处在这一民族危亡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教育与自强的关系，主动担负起辅助民众教

育的责任，或推荐书目，或提出合理化意见，或参加读者活动，或辅导知识水平较低的读者……他们成为了图书馆发展的助力军。

3.2.2 图书馆于学生

侨乡新会，教育事业发达。广大华侨在侨居国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又亲身接触到西方文化，能够深刻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家乡积极捐资兴办教育，造福桑梓。1938年新会全县公私立中小学发展至560所，学生达61,875人^[20]。教育水平决定着阅读的需求量，景堂图书馆的诞生自然吸引了大量学生。对于低龄学生来说，初时图书馆可能只是新鲜的事物、课余的调料甚至一种娱乐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认识到图书馆的价值，读书的兴趣越来越大，不知不觉中图书馆帮助其养成了阅读的习惯^[13]；对于高龄学生来说，图书馆是其第二课堂，是知识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可在图书馆研习功课，或进行课外阅读。更有部分学生走进图书馆充当志愿者，缓解因业务发展带来的馆员不足问题。据馆史档案记载，曾有数批平山义塾、冈州中学的学生入馆服务，志愿者服务培养了他们奉献互助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0](3)}。

3.2.3 图书馆于普通识字民众

新会普通民众识字率颇高，但当时新会文化娱乐场所非常贫乏，仅有三间影剧场，加上经济困难，一书难求，家庭订阅报刊者也是少之又少，他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景堂图书馆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获取知识和信息的窗户，有着相当吸引力。图书馆的报纸杂志内容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内外重大事件均可知晓，非常受普通识字民众喜爱。1927年《扩充本馆之一个意见》提到：报纸杂志为一般人所喜阅，本馆初办时，报纸只有8份，未几即觉缺少乃增至16份，仍不够又增至22份^[21]……1938年1月出版的《景堂图书馆简况》有录，每月陈列报纸约22种，汉口3种、长沙1种、广州7种、香港5种、开平1种、新会4种、美国1种，每月陈列新到杂志约100余种^[20]。

3.2.4 图书馆于目不识丁者

景堂图书馆不仅是一个阅读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化休闲中心。地处新会中心位置,前为马路,后近池塘,花木清新,楼台宽敞,既具交通之便,复得幽静之趣^[22]。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加上免费开放,进馆参观的民众络绎不绝,开馆之初进馆参观人数最高日达三千之数^[23]。其中有部分目不识丁者,他们虽然不识字,但可以在图书馆内赏美景、观展览,翻检并浏览报纸杂志,接受文化的熏陶。1978年12月14日,香港《文汇报》刊载的一名曾居于新会的读者的来稿,述说了儿时的生活逸事,文中提及儿时是景堂图书馆的常客,和许多未识字的玩伴呆在儿童室翻检图书,往往及至满头花白的门侍敲钟闭馆,他们才会离开^[24]。

3.3 社会环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当时的新会民生凋敝,社会各界希望通过社会教育来提高国民思想素质,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但新会政府经济困难,无法拿出足额资金修建图书馆,此时华侨捐建一座功能完善的图书馆,自然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1925年6月22日,景堂图书馆开幕礼记:警备司令送告示一纸来馆,文曰“图书馆内不准驻兵”,盖建国粤军警备第六司令部印;县署送告示一纸来馆,文曰“县长布告,景堂图书馆现已开幕,凡有军氏人等到馆阅书均要照依时刻,遵守规则,毋得喧哗妄动,切记。此布民国十四年六月”,盖新会县长印^[25]。抗战时期转运珍贵图书赴港,为了避免过关卡时不必要的麻烦,1939年8月5日新会县县长李务滋签发新会县政府指令帮助过关^[26]。正是有了政府的支持,景堂图书馆才可以专注于馆内业务的发展,从而取得长足进步。

图书馆是一乡一县地域文化的凝聚与缩影,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集中体现。欧式的建筑,优美的环境,孜孜不倦的读者……景堂图书馆迅速成为新会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本地乡贤均以此为荣,纷纷到馆参观,外界精英

也慕名而来。1925年6月开馆后至12月,各界名流到馆参观15批次^[27],其中有李济琛师长、省教育厅特派员、新会县长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更是在图书馆主楼题写了“智识府库”四个大字。随着一波又一波社会名流到馆参观,景堂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高,不止在广东省甚至全国图书馆界都占有一席地位,这对景堂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 结语

景堂图书馆是民国时期华侨私立图书馆的一个典型代表,是研究民国时期华侨私立图书馆发展建设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案,其捐献之巨大、成绩之显著、精神之可嘉,令世人瞩目。冯平山先生因爱国爱乡的情怀回乡捐办图书馆,以启迪民智、服务社会为理念,取得了骄人成绩并使图书馆保持长久生命力。究其原因:一是图书馆内因。冯氏雄厚的资金力量为图书馆建设提供经费保障,约请专业人才队伍对图书馆实行专业管理,契合民意不断创新服务。二是读者的需要。侨乡新会,人文气息浓厚,读书氛围较好,图书馆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知识及信息的需求。三是政府的推动。在时局艰难、经济薄弱的窘境下,政府依托图书馆启迪民智,支持图书馆工作并积极宣传图书馆,以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今天,社会的发展让图书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图书馆育人的使命和服务的宗旨没有改变,民国时期华侨私立图书馆的发展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考证分析民国时期华侨私立图书馆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对于当代基层图书馆加强内部管理、根据读者需求拓展服务模式、争取社会力量支持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冯平山.冯平山自记[M].新会:景堂图书馆,1924:5.
- 2 冯平山先生七十寿言汇录[M].新会:景堂图书馆,1930:264-265.
- 3 景堂图书馆.景堂图书馆概况[M].新会:景

- 堂图书馆,1926.
- 4 冯美莲,尹耀全.废藏远见——冯平山[M].香港:商务印书馆,2013;54.
- 5 景堂图书馆.景堂图书馆指南[M].新会:景堂图书馆,1933.
- 6 袁梅梅.新会景堂图书馆抗战时期转移保护藏书纪略[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2):80-83.
- 7 景堂图书馆.景堂图书馆民国二十七年各种表册[M].新会:景堂图书馆,1938.
- 8 李仪可.文象笔录[M].新会:景堂图书馆,1987.
- 9 普通阅览室复办计划附馆舍修建程序(1949年)[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10 景堂图书馆.景堂图书馆民国十四年各种表册[M].新会:景堂图书馆,1925.
- 11 吴永贵.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典范[J].图书馆杂志,2001(8):55-59.
- 12 梁如松.冯平山先生与图书馆事业[J].新会文史资料选辑,1984(4):55-58.
- 13 任家乐,刘春玉.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的生存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2):99-105.
- 14 黄柏军,李海燕.民主人士陈照薇家族的命运浮沉[J].源流,2011(3):60-69.
- 15 本年度报告(1932年)[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16 本年度报告(1933年)[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17 1926年10月馆务活动(1926年10月1日)[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18 儿童读物展览会报告书(1936年)[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19 景堂图书馆.战时图书目录[M].新会:景堂图书馆,1937;2.
- 20 新会县教育志编写组.新会县教育志[M].[出版者不详],1991;1.
- 21 扩充本馆之一个意见(1927年)[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22 景堂图书馆.景堂图书馆简况[M].新会:景堂图书馆,1938.
- 23 1925年6月馆务活动(1925年6月28日)[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24 古冈.我所知道的冯平山[N].文汇报,1978-12-14(13).
- 25 1925年6月馆务活动(1925年6月22日)[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26 1939年8月馆务活动(1939年8月5日)[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 27 1925年6月至12月馆务活动(1925年)[A].景堂图书馆,档号:未编.

(莫艳红 馆员 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8-08-05